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GXIAN

陈漱渝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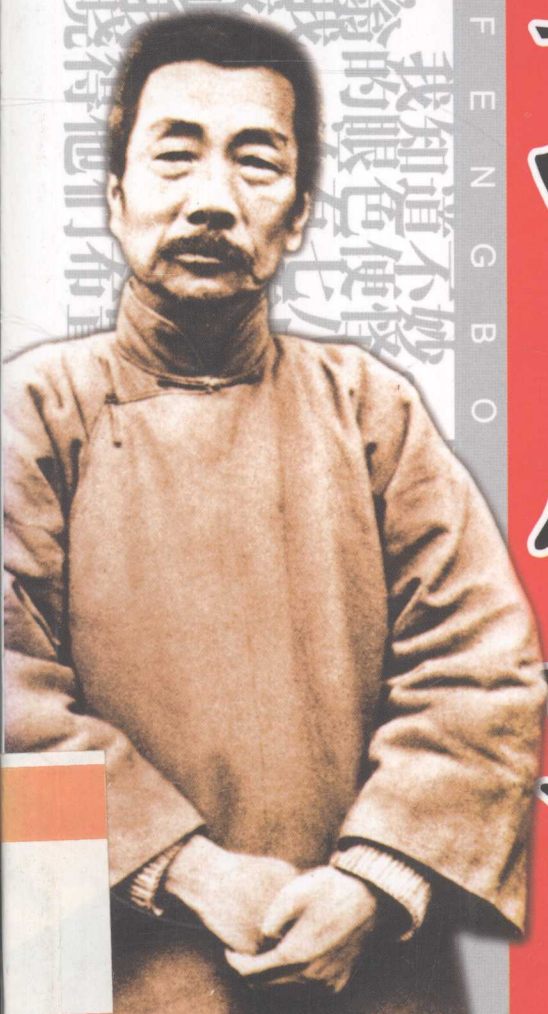
陈漱渝 编

中

鲁迅风波

大众文艺出版社

L U X U N F E N G B O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主编 陈漱渝

鲁迅风波

陈漱渝 编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贬损鲁迅，意欲何为

——致中国作家协会一封公开信

中国作家协会：

读今年《收获》第2期，上有三篇评述鲁迅的文章。王朔在批金庸之后要批鲁迅，“屠场就在《收获》”，这事早有预告。另又见到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及林语堂一篇老文，堪称“集束炸弹”。阅罢，作为鲁迅故乡的一名文学工作者，实感惊忿。夜不能寐，草书此函并公示，当与不当，求正大家。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这是盖棺论定了的。鲁迅逝世，当时的上海文艺界隆重追悼，以“民族魂”大旗裹尸；死后数十年，海内外研究会林立，这都是出乎民意之事，绝不是某个政治人物所“操纵”或“左右”的。现在有一种怪论，认为有了毛泽东对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

的革命家”的评论，才使鲁迅盛名，并由“人”变“神”，此论实为偏颇。鲁迅长毛泽东十二岁，鲁迅先期是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1904年在日本参加了光复会），毛泽东之于鲁迅，是读者，是学生，毛泽东崇拜鲁迅，更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毛泽东生前曾对诸多英雄模范、伟人先烈有过题词和评说，如果都要重新评价，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贬损鲁迅之风始于80年代之初，有为鲁迅“骂”错的人喊冤，捧被鲁迅“骂”过的人，有把自己作品与鲁迅比而公然宣称“鲁迅杂文不及我”者，有破口直骂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反动性不证自明”的，还有一些30年代与鲁迅有过节而今健在者（如章克标等）放出的流言中伤，不一而足。这次是在一本文坛有较大影响的杂志上抛出集束文章，并都是大腕级“名家”，似乎想用重拳和组合拳，给鲁迅以致命的击打。

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

冯骥才在他的文章中，首先肯定鲁迅是文学史上第一位用独特文化视角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人。然而，他立即又指出：“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而且，“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这么一说，鲁

迅的“国民性批判”，似乎是拾了西方传教士的牙慧，而且还盲目崇拜了西方霸权思想。所谓功，成为泡沫，过，却成了实实在在的双料货：鲁迅用文学创作、用文学形象演绎了、印证了西方传教士对东方民族的偏见的诬识，简直成了西方文化侵略的内应和献媚者。这便是懂“中国功夫”的冯骥才点鲁迅的“穴”。

王朔《我看鲁迅》仍是使用打“下三路”的惯伎。他认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他用这种“耍王八蛋”的手法，对一位文学大师进行了肆意的嘲弄，贬斥，讥笑。鲁迅被套上了剥夺他人自由思想的“精神自由之神”的恶谥，但这条大罪，正如《南方周末》一位学者驳斥的那样：“像这样一位生前毫无自由权利可言，顶多配写‘伪自由书’的人，今天怎么竟沦为自由的死敌？”看到“佛头着粪”而产生快意，这是“文革”时代红卫兵“破四旧”的那种作法和心态，才能用错了地方的王朔，现在正成为文坛的红卫兵在那里恣肆横行。

重新刊登林语堂的《悼鲁迅》，《收获》的编辑自然有其用心的。这篇名义是悼鲁迅的文章中，林语堂给鲁迅画了两副“活形”：“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

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癫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酒，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活形也。”看这两副“活形”，鲁迅近乎街头寻衅耍赖的牛二，没有理智的堂·吉珂德。“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鲁迅“五伤”而死，在倡导“闲适”的林语堂看来，几乎是活该。

读了这么三篇文章，鲁迅成了什么呢？“伟大”这字眼早该攒到太平洋去，余下三个“家”——说他是思想家，已被指认为西方传教士傲慢与偏见的应声虫，图解者；说他是文学家，王朔批之：“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说他是革命家，“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不说他“反革命家”已是万幸了。说他是战士，王朔和林语堂这点倒都是认可的，林语堂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并为“战士”构画了上面那两副“活形”；王朔认为“譬如病菌，无论是战士还是花蝇携带都会使人生病。”带着病菌，浑身脓疮，杀狗取乐，烂醉骂人，一位死人一位活人赐给鲁迅的“战士”，实是诬为兵痞。

让神走下神坛，让历史恢复到真实的面貌，这是应该的。但用极端的手法，用打倒和否定代替“度”的调节，

这其实把神变为鬼。对待鲁迅，我认为一定要把后人强加于鲁迅身上的东西和鲁迅剥离开来，即使因当年他言语批及而后遭殃的，也大都是整人者利用了鲁迅，与鲁迅本人无关。（评法批儒时，被孔子所杀的少正卯不是成了英雄？难道是少正卯自己要当英雄吗？）当年鲁迅肯定和褒誉过的如冯雪峰、胡风等，并不因鲁迅的肯定、表扬免遭厄运，这又可反证，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伟人，我们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态，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美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

《收获》杂志封面上赫然打着“巴金主编”，我们知道巴老是崇敬鲁迅的，他在1983年来绍参观鲁迅纪念馆时，留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题词。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

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关注此事，给读者和会员以一个明确的说法。作协的领导，对肆意贬损、侮辱鲁迅等大师级文学前辈的现象

应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在我手头就有一本今年第3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上面转载了一位名叫葛红兵写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作者用讥消、轻薄语言，把20世纪的现当代文学成就作了全面否定，其中说：“我曾经将巴金《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我的学生听，结果学生们大笑不止，世界上还有这样不堪入耳的文字？竟然还是经典作品。”这位三十二岁的教师就这么狂妄地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这么刻薄地讥嘲现代白话文学的拓荒者、先驱者，这是一位一边鞭笞前辈又一边啃着前辈骨肉的寄生者（他是现、当代文学博士）。如果我们纵容这种无知和狂妄，纵容这种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是一种严重失职！

希望这信能在我们的机关报《文艺报》上刊出并复示。

顺致

敬礼！

会员 朱振国

2000年5月22日

（注：作者供职于绍兴市文联，系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

（原载《绍兴日报》2000年5月25日）

走近鲁迅用心良苦

《收获》杂志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记者：《收获》为何想起来开《走近鲁迅》这么一个专栏？

程永新（《收获》副主编）：世界文坛上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对于中国人来说，说不尽的是鲁迅。鲁迅身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鲁迅及其作品含蕴丰富，鲁迅不仅是一位作家，写出了很多深刻的作品，而且，他自己生存的本身也是一部作品，也许，后一部作品比他其他所有的作品更给人以启示。第二，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文学界内，而是很多领域，影响了几代人。但是，鲁迅的这些影响，或者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他的接受并不是一贯的，而是纷纭不一。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考虑到近年来社会上对鲁迅的议论很多，为了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鲁迅，

我们就开设了这么一个散文栏目。

记者：今年第二期《收获》上集中刊发了一组负面反映鲁迅的文章，有人称之为贬鲁“集束炸弹”，请问《收获》的选稿标准是怎样定的？

程永新：这个专栏是开放型的，接受各种声音，从各种角度观察、感受鲁迅。文章的体裁是散文，一本正经的论文容易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而注重感性、文笔活泼、立意新颖的散文更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记者：为什么把死人的文章也抬出来了？

程永新：这个栏目，我们考虑每期收录一篇鲁迅同时代人的声音，第一期是鲁迅的同乡许寿裳，第二期是鲁迅的论敌林语堂，第三期是鲁迅的学生萧红，第四期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这样做，目的是使读者从各个角度近距离真切感受鲁迅。

记者：《收获》第二期出来后，文坛、学界颇多议论，可谓沸沸扬扬，你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肖元敏（《收获》杂志副主编）：鲁迅是人不是神，大家都有权评说。至于我们杂志社，本身不发表观点，只是提供一个舞台，让作家讨论，让读者议论。有多个声音，并不见得是坏事。

记者：你对朱振国的公开信怎么看？

程永新：《公开信》还待好好研读。我个人认为，讨

论鲁迅，不应该有禁区。而且，只要全面读完一二三期《收获》上的“走近鲁迅”专栏，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文章是正面维护鲁迅的。即便是冯骥才、林语堂、包括一贯口无遮拦的王朔，都是在肯定鲁迅的大前提下展开讨论的，而且，态度也是诚恳的。我希望朱振国看完六期“走近鲁迅”后再写《公开信》不迟，如果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散文，也可以考虑在《收获》发表。

记者：社会上有“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进行重新排名”之说，对此，你怎么看？

程永新：作家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各人有各人的风格，这和体育运动员不同，排名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么傻。

程永新等

（原载《绍兴晚报》2000年6月7日）

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

金 盾

2000年6月7日上午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请副馆长陈漱渝先生就鲁迅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热点谈谈个人感想和意见。陈先生经过冷静地思考后，对来访的记者谈了如下看法——

“自从去年年底刮起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这些参与‘断裂’事件的自由作家自己讲得很清楚，他们要‘断裂’的并不仅止于鲁迅传统，而是要‘断裂’现行文坛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这是中国当前某种社会思潮在鲁迅研究领域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如果不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单就鲁迅论鲁迅，那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这种现象，学术界有不同态度。有的学者认为，

鲁迅作品已成为文学经典，其地位是摇撼不了的。鲁迅无需‘保卫’。对贬损鲁迅的文章也不必理睬，否则反而促成那些‘骂’鲁迅的人成名。这自然也是一种看法和态度。但是，我认为对于批驳贬损鲁迅观点的做法更应该予以支持。有人既然能对贬损鲁迅的做法用‘平常心’去看待，那对于捍卫真理的行为更应该予以理解和宽容，而不能求全责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贬损’鲁迅，并不包括对鲁迅历史局限性的科学分析，更不包括鲁迅研究领域的不同学术见解，而是专指那种背离事实和学理一心只想颠覆鲁迅的噪音。

“有人质问：为什么鲁迅就不能批评？我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不允许批评鲁迅的情况。鲁迅本人历来反对神化任何历史人物，当然也反对神化他自己。他生前就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项项‘纸糊的假冠’。‘十年浩劫’期间，利用鲁迅为现行政策服务的情况是有的，但并没有人认为鲁迅完美无缺。就连对鲁迅评价最高的毛泽东，也曾批评鲁迅对中医和京剧的看法不大正确，杂文中谈政治多谈经济少，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新时期以来，广大鲁迅研究者也都反对匍匐着研究鲁迅，而主张跟鲁迅进行平等的精神对话。我个人到高校讲鲁迅的时候，也经常是从‘并非完人的鲁迅’讲到作为伟人、巨

人的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生前死后遭到这么多围攻、谩骂、诬蔑、曲解的，莫过于鲁迅。令人遗憾的是，真正能够击中鲁迅要害的狙击手，似乎至今仍未出现。

“在《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中，鲁迅曾情词恳切地写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人，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前进方向的光辉代表。我们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如果一味想把他当作绊脚的‘老石头’踢开，结果只会伤了自己的筋骨。”

（原载《文艺报》2000年6月10日）

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

——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

冉茂金

记者：今年《收获》第2期刊出王朔文章《我看鲁迅》，在文坛内外激起巨大反响，使重看鲁迅几成一个大众话题。您是怎样看待王朔文章的？

陈：王朔的文章采用了一些游戏笔墨，但不是游戏之作，他是经过冥思苦想，精心构思的，文章里当然包括了他阅读鲁迅作品的一些感悟、一些内心体验。王朔有他的文化选择的自由，他可以有他心目中的鲁迅。但他的文章绝不是对鲁迅的定评，不代表研究鲁迅的新成果。王朔作为一个所谓自由作家、反体制作家，他的文化思想有其一贯性，就是要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权力、颠覆传统。他评鲁迅也是服从这一总的目标，并不是孤立地谈鲁迅。所以，我们就鲁迅和他谈鲁迅，很多东西谈不清楚，

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王朔评价鲁迅的方法也有问题，例如他把阿 Q 和祥林嫂作机械对比，而不知道文学典型有不同的类型。祥林嫂是非常生活化的，而阿 Q 则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本为就不宜搬上舞台。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 Q 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王朔的批评反映出了他在文学赏析方面的理论盲点。与其把王朔的批评看作是一种学术见解，不如看作是一种时尚化的文化酷评、文化摇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记者：《收获》上还刊登了冯骥才先生的《鲁迅的功与“过”》。冯先生是尊崇鲁迅的，在文章中也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深刻、独特和责任感。但他却提出，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采取的是西方观点。您认为有道理吗？

陈：冯先生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到，只是从另一篇批评文章里看到一些关于他的观点的摘引，摘引得是否全面我不清楚。冯先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但并不是一位鲁迅研究者。他只知道鲁迅读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而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整个中外文化渊源的了解可能不很全面。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是近代中国人思考中国命运前途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章太炎等先进的中国人看到，要救中国，必须革除中国文化的

积弊，必须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所以梁启超曾提出新民说。外国传教士是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用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的，对中国民族性的剖析有极大的片面性，甚至包含有歪曲诬蔑的成分。鲁迅对看外国人赞扬中国文化的书保持高度警觉，而希望中国人读读外国人针砭中国民族性的“恶辣的书”，通过自省而自净，而自强，必须看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西方传教士的观点具有本质的不同。鲁迅讲过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满是血痕，然而能够支撑到今天，毕竟是伟大的；他还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吗？》。所以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是以肯定国民性的优点为前提的，是以振兴中华民族为目标的。

记者：林语堂把鲁迅定位为战士，您认为他对鲁迅的看法有无可取之处？

陈：当然有。他把鲁迅定位为一个战士，我觉得很准确。他引用海涅的话——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来形容鲁迅，十分恰当。鲁迅就是一个论战型的作家，他反对折衷调和，反对四平八稳，看到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便拍案而起，敢笑敢骂敢怒敢打。当然，林语堂并不认同鲁迅的战斗目标，他们的交往也先亲后疏，他也是鲁迅文化批判的对象。

记者：近日，绍兴作协主席朱振国先生认为《收获》第2期上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对鲁迅的否定，他把《收获》